

● 社会学

“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发生学阐释^{*}

朱炳祥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炳祥(1949-), 男, 江苏靖江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摘要] 文化发生的动因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 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和符号活动, 文化在变迁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所造成; 而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 一种新文化的形成, 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的“叠合”; 故而, 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本土化”。未来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可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 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 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关键词] 全球化; 本土化; 关系; 发生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 G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5-0630-06

—

文化发生学主要研究文化的生成与变迁问题, 变迁问题也是生成问题, 因为它是“新的文化”的生成问题。是“全球化”, 还是“本土化”? 这是学者们对于人类文化当代变迁趋向的不同回答。持“全球化”的学者, 更重视文化变迁中的一致性与普遍性; 持“本土化”的学者, 更重视文化变迁中的差异性与相对性。从发生学角度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各执一端的争论的批评, 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二是文化生成与变迁的方式是什么。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认为: “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 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 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1] (第 21 页) 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物的建构是形成主体和客体的关键性因素, “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 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 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 那么, 关于认识的第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 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 “从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并不是知觉, 有如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那样, 而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1] (第 22 页) 因此, 研究认识的发生需要从“活动”开始。

因为人类认识的发生也是人类文化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所以发生认识论的原理适用于文化发生的研究, 文化的生成与变迁的动因都是由“活动”造成的。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 从其先驱人物维柯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布尔迪厄, 一直存在着注重人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各种不

同文化形成的作用研究的传统。皮亚杰是通过儿童的活动来研究认识发生问题的，但儿童的活动是一种简单的活动，不能包括全部的人类活动；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类学思想中，“活动”的内涵被大大拓展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被扩大到一切社会生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又将人的“活动”的不同内容具体展开，它包括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他人类学家的论述，可以将人的实践活动看做一个繁复性结构，大致可以概括为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活动（第一种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第二种生产活动），人的精神生产活动三个方面。

第一种生产活动所处理的课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创造的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人类的物质成就，这种物质成就的累积便成为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便是科学技术知识。第一种生产的目的在人类早期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时候，是为了人类自身能够生存下去；后来，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目的便是提高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水平。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掌握宇宙飞船制造技术；将来也许会掌握外层空间的开发技术，其最高目标还是开头由之出发的那一个人类的生存问题。第一种生产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世界，任何不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活动都有可能威胁到生存问题或生存水准的提高问题。因此，这种生产活动通过“偶然的并列”进而创造新器具的“发明”（Making），以及使某些已经存在但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或事物的客观规律变得为人所知的“发现”（Finding）^[2]（第23-24页），在任何地方都是一致的，惟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构成，任何民族的发现都是一致的；发明计算机与制造原子弹，任何科学家所采用的原理也都是一致的；世界各地的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都是运用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又都运用磨制石器，这在世界各地全一样。这种一致性无论是独立发明也好，接受文化传播也好，似乎没有追索的必要，因为结论已经呈现：在这个经济技术领域内，人类的文化具有趋同性的特征。

第二种生产活动却与此有所不同，它所处理的课题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二种生产虽然发端于“种的繁衍”，却并不是简单的两性直面相对。就生物学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女子配合成婚，但在人类群体中却有着许多不可逾越的婚姻规则。第二种生产看似处理的是异性之间的关系，但却牵连与弥漫到各种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人类因受到彼时彼地不同的群体内外关系的制约，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就不同，这就形成了各异的婚姻形式，并造成了由此发展而来的家庭、家族、政治、国家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差异性。即使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物学目的，也因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被异化。在生殖问题上，植物世界的雌雄授粉是在花期进行的，动物世界是由发情期来协调的，它们都有一定的时间性限制，而人类并非如此。女前人的发情期消失，是人类文化对于人类生理特征的一次最具决定意义的重大改铸。在动物那里，发情期的性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正是在发情期，雌性才能刺激雄性，于是达到了一种两性的调节与和谐。而人类大不一样，女性发情期的消失使人类的性合不再限于某一特定时期，于是一切变得混乱不堪。人类男女间的每一次性合并不是为了生一个孩子，相反，人类却去追求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为“欲仙欲死”的享受而采取无数的措施避免生育。在这里，手段与目的彻底地颠倒了：手段变成目的，仅占据万物之一类的“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因此，即使是纯粹的两性配合，不仅是生物学意义，而是有文化意义包含其内。

精神生产活动所处理的课题是人类自我文化创造问题，其直接成果为人类各种精神产品。人类精神生产活动是人类运用符号所进行创造的活动，因此亦可称之为“符号活动”。符号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质活动，它区别于第一种生产活动与第二种生产活动，仅以自身为目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创造，它表现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观念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典籍、不同的价值体系等等。对此，我们从符号最初发生时与事实的关系的视角来窥探符号的“本性”，以理解这种“本性”所造成文化上千差万异的原因。

人类最初的符号活动是通过对客观事物命名开始的，在命名活动中，人们所处理的是符号与客观实

在之间的关系。但是,名称并不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所论述的名实关系、形名关系中就包含了这一思考。《墨子》认为“名”有“达、类、私”三种,私名,即专名,这是给客观实在的某一个具体事物命名的,而“类”则是一类事物的共同的名称,“达”则是比一类事物的通名还要大的概括,是各种“类”的总括。从墨子所举这三类名称来看,只有专名(即专名)与客观事物是对应的,其他两种名称并不与具体的事物一一对应。《尹文子》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抽象名词以及具体名词中的“通名”其实都是“有名而无形”的。不仅如此,《尹文子》将“名”扩大到很多抽象观念领域中,他认为:“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名之三科所指对象有许多并非客观存在的事物。

名与实并不一一对应的思想,东西方是一致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区别了“第一性实体”与“第二性实体”,“第一性实体”是指诸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它是一个专名。但是“第二性实体”虽然也是实体,由于它“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具有某一性质的一类东西”^[3](第 16 页),所以它“并非真的”指“某一个东西”。也就是说,“第二性实体”已经偏离了事物。

符号与客观实在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从“轴心时代”开了头,此后被一些著名的学者继续着。现当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把古代关于符号与实在的思想大大地发挥了,研究也更为深化。索绪尔则直接地批评了将语言的基本原则看做“不外是一种分类命名集,即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的看法,他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4](第 100-102 页)他把概念称为“所指”,音响形象称为“能指”。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德国语言哲学家弗雷格则指出:并不是所有具有“涵义”的“指号”都“指称”客观事物,“‘离地球最近的天体’这些词具有涵义;至于它们是否有指称则很可怀疑。‘最弱收敛级数’这个表达式有涵义,但是可以证明,它没有指称,因为对于任何收敛级数,他们总能找到另一个收敛性更弱的级数。因此,对于涵义的把握并不能保证相应的指称的存在。”^[5](第 3-4 页)

符号偏离事物以及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的直接性后果,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符号的差异性形成。而当符号一经产生以后,它还可以进行随意的组合,由此形成各种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系统。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语言抽象到一定的程度,即把具体的观念(如熊)从其具体的实际环境中抽象出来、并去掉其许多特殊的属性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和其他同样抽象出来的观念结合拢来,或竟给它以某些属性,尽管你从未遇到过一只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或是具有这样的属性的熊,你仍然可以这样做。例如,你可以说熊正在玩一种乐器。你可以玩弄你的字眼。”^[6](第 28 页)本来人才能玩乐器,但人类已创造了“熊”这个词,也创造了“乐器”这个词,只要把这两个词组合起来,那么,在初民那里,就生成了“熊玩乐器”的事实,在现代人这里,就生成了“熊玩乐器”的童话文学。卡西尔在说到符号所具有的这一性质时曾说:“人在建造人的世界时不依赖于他的感性材料的性质。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7](第 46 页)中国文化中有“龙”这个名称,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这种动物,从古生物学的角度也找不到“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的动物,它仅是符号的组接而已。当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是一种独特的象征中国文化的特有符号,与世界其他文化就形成了差异。

总之,“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以及符号偏离事物的特性为一种符号系统与另一种符号系统在外在形式上的差异提供了解释;而符号的随意组接的创造则为各种符号系统的内在差异提供了依据。

二

与文化的生成一样,文化的变迁(即“新的文化”的生成)也是由“活动”造成的;但是最初的文化生成与后来“新的文化”生成有着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同之处。当第一个“猿人”遇到野兽袭击突然拾起地上的

石头朝着强敌猛击而创造最初的文化时,他没有任何文化传统负担,也没有任何别的文化可供借鉴;而后来的每次新的文化创造所形成的变迁,都是在人类文化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既需面对文化传统,又不能回避外地文化的传播。这时文化的创造性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异地文化的抑扬,这种抑扬的规则就是新的文化的生成与变迁方式。这一方式,可以用“多重时空层叠整合”这一概念来说明。所谓“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其基本内涵如下:当一个地区的文化由于长时期的发展变异以及新的经验的积累出现新文化现象的时候,旧文化现象的许多主要部分不是以消亡和破产为基本特征,而是经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以后,依然被一层一层地重叠和整合在新文化结构之中。这种新旧并存,并不是由于力量的消长方面,新的暂时还不能消灭旧的,需要在时间的发展中来逐渐完成新旧替代的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实现了新旧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理解、协调、包容、让步。也就是说,原先的文化并没有死亡,而依然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由传播途径而来的异地文化,也是通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以后,被一层一层地重叠和消融在新文化结构之中。于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发生的文化现象便凝结、层累、整合在同一种文化结构之中。而且这种文化时空的层叠整合,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经过多次。早一些发生的文化与晚一些发生的文化重叠并整合以后,在更晚一些的时候,这种被重叠整合了的文化又被叠合到新的文化结构中去;因此时间越后,越是被堆积起更多、更复杂的时空内涵^[8](第2页)。

对于“多重时空的层叠整合”的文化变迁规律,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层叠”。有的研究者将文化的发展比喻为滚雪球,这个雪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是越滚越大了,“雪球”显然是“层叠”的产物。然而,人类是十分懂得轻装上阵的“符号动物”,一位贵妇人无论参加多么重要的晚会,也无论她多么富有,都绝不会将古今中外所有漂亮衣服都穿戴在身上,她只是选择她自己最满意的那一套。“选择”既是文化“传播”的基本特点,也是文化“进化”的基本特点。“借用是选择性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接受他们与之接触的一个或几个群体的文化内涵中提供的或已有的所有东西。一般说来,文化特质的被接受与排拒,视其功用、适应性以及对接受一方的文化有无意义而定。”^[2](第31页)被选择的外来文化按照功用的高下、适应的程度,以及对本文化意义的大小,组成一个排列有序的结构。当然,在战争年代及被侵略占领的年代,文化往往有强迫接受的情况出现,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依然是一种选择。而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在文化“进化”中表现得也许更为彰显,文化传统是无法抛弃、无法回避的。此时的选择也是将传统按照新文化需要建立一个有序的结构,最有效用的、最适应的往往被置于被选择序列的首端,最不需要的被置于末端被批判的地位。经过这两个方面的选择并且被排列有序的“异文化”(外来文化)和“旧文化”(传统文化)组成的层叠结构,为“整合”准备了前提。“层叠”与“整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层叠是条件,整合是结果;层叠是初始状态,整合是终极状态;层叠是混合,整合是融化。整合的目的是使文化变成一种有生命的类似于有机体或克鲁伯所说的“超有机体”的东西。

“层叠”中的文化要达到“整合”,须进行“重新解释”。重新解释是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文化特质和从体完全按照其原初面貌传递的情形很少。它们通常要经过在形式、功能和(或者)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接受一方文化的特殊需要。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规则与同化和综摄一起起作用。如上所述,同化是指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成为在性质上全新的传统,而综摄是单个特质或从体而不是整个传统的融合。重新解释是这些新的综合物赖以发生的总过程^[2](第38页)。重新解释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解释,只有经过重新解释,异地的文化方能进入现状文化的结构之中,成为新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形成文化在空间上的叠合。同样,也只有经过重新解释,传统文化方能进入现状文化的结构之中,成为新文化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形成文化在时间上的叠合。

对于整合需要注意时空两个维度,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有相关的论述。她认为:“不具有相互内在联系、而且在历史上独立的种种特质,现在却结合在一起而且变得不可分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整合的,具有思想、行为的一致模式^[9](第35-36页)。某一种文化为了达到对自身发展历史中的某个趋向进行强调,这种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独立的种种特质”可以被整合到现实的文化结构中来。每一种文化又都有着自己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从周围地区可能的特质中

选择出可利用的东西,放弃不可用的东西。人们还把其他特质加以重新铸造,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求。”^[9](第 36-37 页)可以推见,本尼迪克特关于整合的思想含有时间维度,即一种文化将自身历史上的种种特质整合到当下状态中来,成为现状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也含有空间维度,即一种文化将异于自身的周围地区的特质整合到自身中来,亦成为现状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除去从理论上假设的开端时期的文化以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总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对与它同时的异质文化(与它自身相异的其他地域的文化)以及对与它不同时的同质文化(它自己的前身)整合的结果。层叠和整合是通过选择和重新解释达到的,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文化整合所达到的是一种有机性。

文化变迁“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的特点,对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如下的意义:既然文化在发生处便存在着一致性与差异性两种情况,那么,在文化发展与变迁时的时空层叠中,这种一致性与差异性一定会保留下来。因为第一种活动所创造的文化成分与新的发展阶段同是这种活动所创造的文化成分层叠整合,得到的是相同;第二种活动与符号活动所创造的文化成分与新的发展阶段同是这种活动所创造的文化成分层叠整合,得到的却是差异。例如:一个氧原子(O)与另一个它的同类(O)结合,得到的还是自身 O₂(氧分子);而当它与与碳原子(C)结合则变成了一氧化碳分子(CO),与氮(N)结合就变成一氧化氮分子(NO)。同样是氧元素的“传播”,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因此,无论“传播”多么“全球化”,文化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层面以及精神文化的层面总有相异性的一面。甚至同一种文化在没有其他任何文化影响的地理空间内传播,过了几代以后,文化的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也会趋异发展。同一语系的不同语支以及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方言就是这样形成的;神话故事的各种不同的变体,宗教仪式的不同操作,也都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在田野考察中亦经常看到同一家族被迁出原地以后的文化趋异性发展的诸多例证。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经验层面上能够观察到的。再从历史来看,世界各地的文化史上,并不存在着绝对本土化意义上的文化,也不存在着完全是传播而不与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拿中国文化来说,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传播从原始时代算起已有几十万年历史,现在的 55 个少数民族依然保存着自身文化的特色。隋唐时期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但它也只是与中国文化结合而不是替代,这种结合有两个产儿,一个是融儒入佛的禅宗,一个是援佛入儒的理学,两者都不是印度文化的照搬,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固守。可以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出现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上都完全一致或彻底差异的任何例证,其所呈现的形态是相同与相异的共存并置。

三

综上所述,在发生学视角之下,我们提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结论:

1. 文化发生的动因在于“活动”,也可称之为实践活动。但这种实践活动,是一个繁复式的结构,它不仅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与工具的生产活动(即所谓“第一种生产”活动),也包括人类“种的繁衍”活动(即所谓“第二种生产”活动),还包括符号活动。第一种活动以人类自身的生存为目的,它决定人类经济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各地存在着一致性。第二种活动既有人类“种的繁衍”目的,更有人类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创造的文化学目的,它是人类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发端处,全世界各地存在着差异性。第三种活动是人的符号创造活动,它以其自身为目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以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为最高目标,全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性,每个不同的个人之间亦存在着差异性。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不同目的与特点所造成的。

2. 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对于传统的文化与外来的文化经过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叠合。无论外界文化冲击的力度有多大,文化变迁皆不能回避传统文化;而无论传统文化的惰性力有多强,文化变迁皆不能回避外来文化。因此,文化的所谓跨国进程不

是所有的文化体系都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去重塑与再构，也不是“地方性知识”的“独立不迁”的傲然姿态，而是本土文化、传播文化与当下状态中新的经验之叠合。因此，不可能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全球化”，也不可能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本土化”。

3. 依据上述两点，21世纪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便可约略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参 考 文 献]

- [1]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美]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4]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5] [德]弗雷格.论涵义和指称[A].语言哲学名著选辑[Z].肖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6] [英]柴尔德.远古文化史[M].周进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7] [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8] 朱炳祥.文化叠合与文化还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6).
- [9]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于华东)

Genetic Interpretat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ZHU Bing-xia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Bing-xiang (1949-), mal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social-cultur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The origin of culture lies in human beings' cre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material production, multiplication of species and symbolic activities (spiritual production), which bring to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hange. The features of multiple time-space superimposition. The formation of new culture is the superimposition, reaching through selection and re-interpret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Therefore, there is almost no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a pure sense. The culture change of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can be described ad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cultural change.” Here, the opposite view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ceives genetic clearing up.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relation; interpretation